

古城旧事

彭庆东

# 恼人的“高空滴油”

而今的冬天, 无论怎样严寒, 屋里已然不用煤炉了。遥想上世纪80年代之前, 家家户户一年四季都在烧煤炉, 到了冬天, 煤炉兼具采暖功能, 多数人家都会在卧室里生一个大铁皮炉子, 从墙壁的孔口伸出一只长长的烟囱, 一直延伸到屋檐下, 几乎到了院里的过道当中, 成了院里抬头三尺的一道风景线。炉火一直燃着, 除了做饭, 可以在炉膛里烤红薯、烤土豆及馍片、窝头片等, 好吃得很。

但恼人的是, 接出屋外烟囱的管口会流出黄黑色的煤焦油, 虽不像如今的“高空坠物”那样危及人身安全, 但煤焦油滴在衣服上油腻且不好洗, 因此走在过道上的人们常常担心悬在头顶上的“高空滴油”。于是, 在烟囱管子的尽头挂一个小罐子接油。小罐子漏油或者脱落, 那就麻烦了。

有一年, 妹妹刚穿上过年的新衣服, 她最喜欢这件大花格子的棉袄, 高兴地在家嘚瑟了一阵子, 便急着跑出去找小朋友显摆。哪知走过隔壁张大娘家门口时, 她家烟囱管口上挂的小罐子被风一吹, 脱落在门前的煤池上, 罐子里溅出的煤

焦油刚好落在了妹妹的后背上, 崭新的大花格棉袄变成了“大花脸”。妹妹伤心地大哭起来, 大过年的让人真扫兴。父亲赶紧帮张大娘家重新挂好了小罐子, 免得再出漏子。母亲又忙着为妹妹清洗大花格棉袄, 清洗了老半天也不理想。没办法, 妹妹过年的兴致就让“高空滴油”给泡了汤。

那阵子, 不但老百姓家里这样取暖, 单位也这样。那时我在市建二公司做预算, 每天早晨一上班, 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生火炉。先用铁钩子把火炉芯子钩起来, 让前一天的废煤渣掉落下来, 再用铲子掏出煤渣, 拎到外面倒掉, 然后用小铁桶装回煤块来, 捡几块废木头, 在炉膛里头放上废纸和木头。点火以后, 再慢慢地放进煤块, 盖上炉盖子。每天周而复始, 麻烦、劳累不说, 办公室里少不了烟雾和煤灰, 年底大扫除的时候可费老鼻子劲儿了, 打扫完, 人累得气喘吁吁。

如今, 煤炉和防“高空滴油”的小罐子早已荡然无存, 代之而来的集中供热、空调、油汀、壁炉等取暖设施让严冬里的屋子温暖如春。我也深信, 取暖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有新的变迁、新的升级。

乡土记忆

李喜庆

## 冬日割白草

在郊区采风, 看见了久违的白草, 心中不免又惊又喜, 惊的是再次见到了小时候常见的白草, 喜的是他乡遇故物, 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割白草的情景。

白草, 家乡人称之为尖白草。一般长在土壤较厚的山坡洼地, 夏季白草一片翠绿, 中心有一根长长的白色的茎秆, 顶上挂着穗毛, 因此有了白草之名。夏秋的白草是牲口爱吃的青草, 人们常常将牲口赶到长满白草的山地, 找一个固定物, 将牲口用绳子拴住, 任牲口自由自在吃草。冬季白草干枯, 北风吹过, 白草晃动, 让人想到南北朝民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不过因为白草生长得矮小, 里面藏不住牛羊, 倒是经常见到兔子、松鼠一类的小动物, 风吹过后, 急速逃向远方。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学校经常搞勤工俭学, 春天拾肥, 夏日割蒿, 秋天拾粮食, 冬季似乎无活可干。学校领导通过熟人联系, 可以把白草卖到阳泉钢铁厂, 因为钢铁厂点炉需要柴火, 白草是最佳物选。于是学校下达任务, 让我们割白草来勤工俭学。

割白草是件技术活, 我刚开始割时就不得要领, 左手翻转抓住白草茎秆, 右手挥舞镰刀砍割, 只将轻飘飘的茎秆割下。表哥笑我说, 看你那捉鸡架, 半天也割不下二斤。于是表哥给我示范, 他

弯腰顺手抓住白草的下部, 镰刀贴着地面飞舞, 不但茎秆收割了, 连茎叶也全部收割, 甚至还卷了些泥土, 分量自然也就重了。

割白草是件劳累的活, 隆冬时节, 天寒地冻, 本该是在家围炉享受的时候, 可却要到野外割白草, 心情之坏无法形容。割草的时候为了方便, 不戴手套, 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因为贫穷, 买不起手套, 只能徒手割白草, 手不但要承受寒冷的侵袭, 还要承受石块、灌木的侵扰。谁知道茂密的白草从里面会有啥, 一次我在割白草时, 就抓上了一个破碎的玻璃瓶, 中指被划破, 鲜血直流, 至今左手的中指上还有一道明显的伤疤。

割白草是件幸福的活, 一斤白草可以卖上6分钱, 现在看来, 微不足道, 可是在那个年代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割白草完成了学校下达任务后, 剩余的当场结算, 卖下的钱就归自己了。这是件简单而幸福的事情。因此, 大家有很积极性, 甚至有的人也加入进来。我就用割白草挣的钱, 买下了自己喜爱的小人书。在当年的春节假期, 翻阅小人书,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学校为此不但减免了我们的学费, 而且还用余钱买下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 晚上大家带上小板凳, 相约到学校来观看电视, 真是幸福之至。

难忘时刻

薛金升



## 家中老物件

家中几件旧物跟随我40多年了, 几次搬家我都没有把它们丢弃, 而且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

蝴蝶牌缝纫机是当年凭券买来的。那时结婚讲究“三转一响”, 我是一无所有。后来, 哥哥不知托什么人给我买来了这台缝纫机, 算弥补了一些缺憾。缝纫机当时是家里最贵重的一件物品, 妻子专门为它做了罩子, 不用时, 把机头放下, 用罩子严严实实裹起来。这台缝纫机不仅妻子用, 我也用。缝个床单、被罩, 衣服、裤子哪里开了线, 我都是自己动手。这个老物件虽然经历了40多年岁月, 但运行起来依然声音清脆, 悦耳动听。前些天我用它给裤子换松紧带, 儿子见我操作缝纫机, 很是惊讶。

台式电风扇是老伴他们厂自己生产的。这是一家生产火车电机的工厂, 当年却小批量生产了些电风扇和洗衣机, 以优惠价提供给本厂职工。

那年我们节衣缩食, 家里一下子添了三大件: 黑白电视机、电风扇和单桶洗衣机。黑白电视机很快被淘汰了; 单桶洗衣机用了几年, 以旧换新了, 唯有台式风扇现在还完好无损。家里装空调后, 这几年很少用了, 但它是当年家庭生活档次提高的见证, 偶尔夏天也搬出来用一用, 总觉得它吹来的风是在诉说着什么, 让人回味和遐想。

二屉桌是结婚时工厂为新婚夫妇配置的三件家具之一, 桌面长一米, 宽50厘米, 显得很简陋。搬到省城后, 它成了我和孩子们共用的书桌。我的几部拙著就是趴在这张桌子上写成的。后来搬到新家, 我换了张大些的桌子, 就把这张桌子放在阳台上。阳台上光线充足, 又有花木簇拥, 我在桌上放了笔砚, 常在上面练毛笔字。颜柳欧王几部字帖在桌上临了不止一遍, 楷体、行书写了一大堆。这张二屉桌衰老得抽屉已经拉不动了, 但还在继续做着贡献。它外形简陋但在我心里却价值不菲, 舍不得把它轻易换掉。

老物件有着岁月的印痕, 承载着美好的回忆。当初来到我们身边时, 它都是新的, 给了主人很多欢乐和帮助, 像老朋友一样, 陪着主人一天天变老。这些年扔过不少东西, 它们因为实用和纪念的双重属性得以保留下来。看见它们, 使我们觉得来路并不轻松。



非常经历

## 惊魂之夜

春潮

我是伯伯和父亲两家人中唯一的男孩。我有三个姐姐, 二姐和我是一母同胞, 大姐和三姐则是大伯家的两个女儿。大姐和二姐都比我大十多岁, 她们俩早就离开了家, 或是去求学, 或是去工作。而三姐只比我大三岁, 所以和我相处的时间比较长, 姐弟感情非常深厚。上世纪80年代, 我虽然已经成家十多年, 但仍然是个无房户, 带着家人到处寻觅住所, 先后搬家有十多次。1984年, 三姐两口子都在榆次上班, 单位刚好分给她一间宿舍, 就搬到了榆次居住, 看到我实在无处可去, 就让我借住到她家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这间小房子地处棉花巷路北的一个小巷子(现在的开化寺南街)的院子里。

记得是这一年雨季的一天, 因为天气不好阴沉沉的, 随时可能下雨, 我就让孩子在我母亲家住下来, 我一个人回了开化寺南街。当时, 我上班的单位离家非常远, 一天下来非常疲惫, 所以一到晚上我就睡得很沉。哪知这天午夜时分, 天降大雨, 而我睡意正酣, 浑然不觉, 突然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 凝神细听, 好像是院中发现了小偷, 邻居们正在追堵, 我赶紧披衣下床, 准备出门加入捉贼的战斗。可是还没等我打开门, 我的屋顶上就传来了脚步声, 只听得希里哗啦一阵乱响, 屋顶早已开了天窗, 只见那贼伴随着瓢泼大雨以及砖头、瓦块直接从屋顶掉进屋里, 而且正好掉在床的正中间, 把床也砸了个大窟窿, 床是报废了, 好在我是有惊无险, 事后想起来, 还真有些后怕。真险! 就差几秒钟, 我就去见马克思了。这时, 邻居们也都追了进来, 自然, 贼是没跑, 被我和院邻逮了个正着。

邻居们都说: “你真幸运, 看着吧,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不要说, 还真给说对了, 此事过去不久, 我就从工厂调到了学校, 又从学校调到了机关。巧的是我就职的迎泽区政协办公大楼所在位置, 正好是我当年化险为夷的所在地。推开窗户望去, 破旧的房屋, 早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 和全市人民一样, 这里的群众早已告别了破旧低矮的老房屋, 住进了水、电、暖、气设施齐全的单元房, 生活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 再也不会出现我所经历的惊魂之夜。

岁月留痕

## 逝去的袖套

解延忠

“袖套”, 顾名思义就是套在袖子上, 保护袖子不受磨损, 特别是袖口部分。用新布做两个略肥于衣服袖筒、长至肘部的布筒, 两端用松紧带抽紧, 学习工作时, 套在袖子上。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戴袖套在学生、伏案工作者中相当流行, 可以说是一种应运而生的时尚。那时,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 衣服的材料以布为主, 做一件新衣服不容易。学生中穿带补丁衣服者, 屡见不鲜。有的人只有过年时才能穿上一身新衣。衣服大多是棉布制成, 少有耐磨的化纤制品。能穿上“的确良”“涤卡”的同学, 都让我“另眼相看”。如果一件新上衣没穿几天, 就把袖子, 尤其是肘部磨破了, 岂不可惜?

为了保护新衣, 袖套几乎成了中小学生对伏案工作者的标配。讲究一点的学生, 尤其是女同学, 几乎人人都备有袖套。上课时, 大家齐刷刷地把五颜六色的袖套套在袖子上。那时仅以为是家长们“抠门”的原因。及至上世纪80年代初, 我从技校毕业后进厂参加工作, 才发现会计科的姐妹们几乎人人都戴袖套, 就连50多岁的男科长也戴着一副劳动布的袖套。我这才明白, 戴袖套不完全是因为贫困, 而是一种时尚, 当时, 崇尚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在某些企业, 袖套曾作为一种劳保福利, 下发给需配备的员工。

我羡慕戴袖套的同伴, 但因为种种原因, 我与袖套擦肩而过。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不愁吃, 不愁穿, 做一件化纤布料的新衣, 十年八年也穿不烂, 袖套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进入新时代, 大中小学校、规模企业, 都统一制作了校服、工装, 且用的都是耐磨布料, 袖套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如今, 袖套已经淡出了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逝去的袖套, 作为过去艰苦岁月的留痕, 将成为我们一段美好的回忆。